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主编 王文章

铜鼓文化



蒋廷瑜 廖明君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蒋廷瑜 廖明君 著

铜鼓文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铜鼓文化 / 蒋廷瑜, 廖明君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12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 王文章主编)

ISBN 978-7-5039-5263-0

I. ①铜… II. ①蒋… ②廖… III. ①鼓—铜器(考古)—介绍—中国 IV. ①K8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4344号

(本书中所用照片除已署名者外, 均由作者提供版权)

铜鼓文化

著 者 蒋廷瑜 廖明君

责任编辑 张勃倩

装帧设计 刘玲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125

字 数 2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263-0

定 价 49.00 元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王文章

副主编：马文辉 刘 茜 吕品田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盛德 乌丙安 田 青 刘文峰 刘魁立

沈 梅 屈盛瑞 周小璞 罗 微 资华筠

总 序

王文章

伴随着新世纪的开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了十几个年头。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

首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初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的广泛参与下，在各级文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并已发展为比较健全的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和传承人保护制度。在进行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国务院已公布了第三批共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148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市、自治区也公布了省级保护名录项目8566项，代表性传承人9564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从十多年前的单个的项目性保护，走上了整体性保护、科学保护和依法保护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保护的意义越来越被人们所普遍认知和理解，人们越来越珍视优秀传统文化，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注程度、参与热情越来越高，全社会已经逐步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围绕着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现在，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方法和方针、原则逐步完善和确立。在总结保护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逐渐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恒定性和活态流变性的基本衍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既不是使它凝固不变，也不是人为地使之突变，而是要让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去自然衍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遵循其本体规律。近些年来，我们提出的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多种针对不同类型项目实施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在保护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在准确认识、总结和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特征的基础上，确立了保护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确立了保护工作的原则：“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保护方针和原则的确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是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机构队伍基本建立。截至2011年，不包括地方财政资金投入，仅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14.3876亿元；2012年，中央财政转移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增长至6.2298亿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成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16个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局）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和队伍基本建立。

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近十年来，北京和全国各地陆续举办了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及保护成果展，对于社会公众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意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两三年来，主要的展演活动如2009年文化部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2010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巧夺天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名工艺美术大师技艺大展”，2011年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徒同台展演”，2012年年初文化部等部门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等都引起轰动，增强了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和参与意识。

六是国际合作和交流不断加强。2004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我国第一批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在四川成都成功举办了三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截至2011年11月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达36项,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2012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培训中心在中国(北京)正式成立,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

在充分肯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乏人、生存濒危的境况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存在传承人年老体弱,人走歌息、人亡艺绝的现象;在保护工作中,重开发、轻保护、轻传承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度开发、盲目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现象仍有发生;一些地方对保护工作认识不到位,保护工作不落实的情况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应该头脑清醒,思想明确,进一步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认真研究解决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真抓实干,从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扎实、深入的开展。

最近,文化部主要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规划的实施及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情况,以及保护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三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督促检查,以便找准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调整。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把各项保护措施落到实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会越做越好。

在概要回顾总结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情况和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保护工作的基础,或者说我们科学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规律,不断取得保护工作成绩的基础是什么,我想,首要的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科学认知。今天,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整体性保护的情况下,更需要继续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进行认真、科学的梳理和分析,进一步探究它的文化渊源,揭示它的价值,总结它的存在形态和演变历程,以及研究如何在把握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保护。

这样的调查、分析和梳理，可以充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性及其杰出的文化、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由此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逐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自觉，关注、重视或主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正是基于此，我们组织专家学者或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者编撰出版了这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200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也曾邀我主持编撰一套“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迄今已出版二十多本。这次经作者重新修订后纳入现在这套丛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项（书）目的选择，则是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确定，每个项目独立成书，分批出版。第一辑收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项，内容涉及传统音乐、传统戏曲、传统工艺、传统技艺等多个领域。它们形式各异，但都以其厚重的历史、鲜明的特征在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并长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精神特质乃至生活方式；如同一朵朵奇葩，千姿百态、绚丽斑斓，与其他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悠久博大、辉煌壮丽。

这套丛书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都是该项目研究的专家学者或项目的传承人，其中不少作者是项目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他们根据自己多年的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本着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精神，详尽梳理每一个项目的历史渊源和沿革流变、分布区域和存续状况，细致描述它们的呈现形态，包括风格流派、技艺特征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作品，并对其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价值进行深入的阐发。这套丛书力图以学术的权威性、叙述的准确性和可读性成为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读物，它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中国读者认识和了解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也为世界人民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一扇窗口。

是为序。

2012年5月6日

目 录

第一章	千古之谜：铜鼓文化的起源	1
第一节	历史记载	3
第二节	民间传说	10
第三节	考古发掘和研究	17
第二章	巧夺天工：铜鼓的主要类型与铸造工艺	33
第一节	铜鼓的主要类型	35
第二节	铜鼓的铸造工艺	59
第三章	历史印痕：铜鼓文化的传播与分布	75
第一节	铜鼓文化的传播	77
第二节	铜鼓文化的分布	83
第三节	使用铜鼓的族群	105
第四章	迷人魅力：铜鼓文化的艺术特征	153
第一节	铜鼓造型艺术	155
第二节	铜鼓纹饰艺术	160
第三节	铜鼓雕塑艺术	171
第四节	铜鼓音乐艺术	187
第五节	铜鼓舞蹈艺术	191

第五章	娱神娱人：铜鼓文化的社会功能 ·····	199
第一节	作为乐器的铜鼓·····	201
第二节	作为神器的铜鼓·····	212
第三节	作为重器的铜鼓·····	225
第六章	两种生产：铜鼓文化的主要内涵 ·····	231
第一节	铜鼓文化与生殖崇拜·····	233
第二节	铜鼓文化与丰饶崇拜·····	256
第七章	薪火相传：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	275
第一节	铜鼓文化与人类文化多样性·····	277
第二节	铜鼓文化的保护·····	298
第三节	铜鼓文化的传承·····	302
后 记	·····	309

第一章

千古之谜： 铜鼓文化的 起源



铜鼓是怎么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神仙创造的吗？这是每一个想了解铜鼓文化的人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将从历史文献记载、民间传说和考古发掘研究这三个方面来探索这些问题。

第一节 历史记载

《后汉书·马援列传》有这么一段话：“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这件事发生在东汉初期，地点是中国南方的交趾地区。那时的交趾相当于今越南北部和中国岭南部分地区，公元前2世纪初，南越国时期设过交趾郡，治所在羸陵（今河内西北），东汉移至龙编（今河内东天德江北岸）。在交趾境内，汉朝官吏与当地民族首领发生矛盾，麓泠县雒将之女征侧、征贰两姐妹揭竿而起，公开叛汉，并自立为王。当时“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七年（41）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率兵南征。马援在军事活动中获得骆越铜鼓，把它熔了，改铸成马的模型；战争结束后，班师回朝，将马的模型献给



广西田林县木
柄瑶寨老在敲
打铜鼓

汉光武帝。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先人本姓赵，因能服驭马，受赵惠文王赐爵号为“马服君”，子孙于是以马为姓。马援本人曾在西北从事养马和从军驯马多年，对养马、驯马有丰富的经验。他在献铜马模型给汉光武帝时的奏表中说：“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历述了古往今来的相马专家，自称曾拜相马专家杨子阿为师，学习相马骨法，“考之于行事，辄有验效”。马援所铸铜马模型，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奉皇帝之诏立于洛阳宣德殿下，以为名马法式，是当时标准的良马模型，也是汉代骏马塑像的纪念碑。

马援征交趾这件事，在岭南地区的历史上影响巨大，以至世代相传，妇孺皆知，人们还为此编出了许多美好的传说。在广西、

广东以及越南境内，凡是大小河流的交通口岸，到处可见到“伏波庙”、“伏波祠”，都是祭祀马援的祠庙；有无数“伏波滩”、“伏波岭”、“伏波山”等地名，附会着马援的传说。

由于马援获骆越铜鼓以铸为马式一事已载入正史，唐、宋以来，不少人便把两广地区出土的铜鼓误以为是马援的遗物，称之为“伏波鼓”，有的人甚至误以为铜鼓是由马援一手创制的。最早将这种附会载诸文字的是南宋静江（今广西桂林）知府范成大所著的《桂海虞衡志》。该书在《志器·铜鼓》条中说：“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为马伏波所遗。”虽然范成大加了“相传”二字，表现了他的审慎，但他此说一出，使后人以讹传讹，生化出许多关于马伏波遗留铜鼓的传说。

这种传说在《桂海虞衡志》成书五十年以后就有了。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卷一一九“钦州”条曰：“铜鼓，古蛮人所用，钦州村落中时有掘得者，相传云马伏波所余。”明代王士慎的《广志绎》卷四也说过类似的话。

到了清代，这种传说就更玄了。有关广西桂平铜鼓滩的传说就是一例。传说马援征服交趾后班师回朝，利用郁江—浔江水道，乘船北上，船中载有铜鼓，到浔江与黔江交汇的大滩时，有两面铜鼓忽然跃起，跳入江中，后来一直沉没在水底，八百多年以后，到了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雍正年间，才分别被渔人从水中打捞出来。这个大滩因而就叫铜鼓滩，也叫伏波滩。

除了马援遗铜鼓的传说之外，还有马援铸铜鼓的传说。此事可能也从《舆地纪胜》开始。《舆地纪胜》卷一〇六“邕州”条曰：“铜鼓，马援所制。”嗣后《大明一统志》说：“武宣县西四十里亦有铜鼓滩，或谓马援铸铜鼓于此。”明人魏浚的《西事珥》说：“旧（梧州）府中有伏波将军所铸鼓，其一尚存。”张穆的《异闻录》则说得更详：

昔马伏波征蛮，以山溪易雨，制铜鼓。粤人亦谓雷、廉至交趾海滨卑湿，革鼓多痹缓不鸣，无以振威，故伏波铸铜为

之，状亦类鼓，名曰骆越之鼓。

这里说的雷、廉是指雷州和廉州，即今广东雷州半岛和广西北海、钦州至防城港一带。

清人屈大均也相信伏波铸鼓之说，并认为这是销毁少数民族兵器的措施。他在《广东新语》“铜柱界”条中写道：

吾意古时蛮里多以铜为兵。伏波既平交趾，或尽收其兵销熔，既铸铜柱五以表汉疆，又为铜船五、铜鼓数百枚，遍藏于山川瘴险之间，以为镇蛮大器。

由于受马援遗铜鼓、铸铜鼓传说的影响，和出于对马援的崇敬，在岭南的许多伏波庙、伏波祠中，都陈列着铜鼓，供人膜拜和观瞻。

明朝洪武年间诗人郑定的《伏波祠怀古》说：

荒祠衰草已凄然，犹有居人话昔年。
铜鼓苔生秋雨后，石墙花落夕阳边。
竹书蚤著平蛮策，沙井空余饮马泉。
词客经过休感慨，云台麟阁总寒烟。

清代诗人黎申产在祭拜钦州马新息侯庙（伏波庙）时也写道：

铜鼓喧阗赛故侯，盘登薏苡不胜愁。
时方贵盛轻朱勃，事到艰难念少游。
早有盛名腾陇右，哪知心力尽壶头。
蛮夷处处还祠庙，况复遗民是马流。

据现代学者研究，铜鼓的创始期大约是在春秋时代，创始者是



湖北襄樊武侯祠至今还供奉着一面大铜鼓

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濮人，而并不是某个英雄豪杰。马援时代所见的铜鼓已是铜鼓艺术繁荣时期的作品了。马援在南征交趾时可能见过铜鼓，也可能虏获过铜鼓，甚至也真的熔化铜鼓铸过马模型，但他不可能铸造铜鼓和到处遗留铜鼓，他绝对不是铜鼓的创始者。

清代诗人黄春谷的《铜鼓歌》就说得好：“漫说南征始巧制，非关伏波美骆越。”

更为离奇的是诸葛亮创制铜鼓的传闻。

关于诸葛亮南征时制作铜鼓一事在民间有两种传说。

一种说法是，铜鼓是诸葛亮南征时在军中制作的。制作这种铜鼓，白天用来煮饭，夜晚用来敲击报警。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做过夔州通判的何宇度，在他撰写的《益部谈资》一书中对铜鼓的形制、大小、纹饰图案，以及敲击的音响做了生动、具体的描述。他认为铜鼓是诸葛亮南征时制作的，因而把铜鼓称为“诸葛鼓”。他说诸葛鼓乃“孔明擒孟获时所制”。后来很多人的著作都援引他的这一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诸葛亮制作铜鼓散埋山中，是为了镇压“蛮夷”（南方少数民族）。《明史·刘显传》说：“相传诸葛亮以鼓镇蛮，鼓失，则蛮运终矣！”《蜀中广记》说：“父老云：诸葛制以镇蛮夷者，鼓去，则蛮运终，理或然也。”《边防记》对此说得更具体：“西南夷部叛服不常，诸葛武侯征抚之，置铜鼓，埋镇诸山，稍就帖服。”

这些传闻始于明代，宋代以前均未见到。《三国志·诸葛亮》中有关征南的记载里没有提到铜鼓。《三国演义》对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描绘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却也没有提到铜鼓。而在明代文献中则不断出现诸葛铜鼓的事。据《明史·刘显传》和《蛮司合志》